

来自江西农村的调查（下）

撬动农村消费，支点在哪里

本报记者 邓建胜

2008年南昌市城乡消费对比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支出	11551.30元	3455.75元
恩格尔系数	35.7%	47.4%
社会消费	469.52亿元	59.37亿元
零售总额	（占88.77%）	（占11.23%）

注：南昌市辖五区四县，农村居民占人口总数53%。

制图：刘先云

启动农村消费的彭家村样本——

30万元投入如何带动1000万元消费

彭家村位于离安义县城3公里外的山坡上。由于有河沙可采且靠近县城,10多年来,这里多数村民的实际收入都要远高于全县人均5918元的农民收入。

“两年前,进村还是一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像这样的下雨天,你们穿皮鞋根本走不过来。”村民彭凤妹说,“现在房前屋后都是水泥路,不下地干活的话,大人小孩都穿皮鞋。上楼进房间,还要换拖鞋。”

在62户居民中,彭凤妹是4户仍主要靠耕作为生的人家之一。靠3年多来的农田收入积累,加上儿子在浙江嘉兴务工带回4万元钱,去年彭凤妹拆了居住20多年的土坯房,建起了三层楼房。家里6口人有3辆摩托车、3台电视机。

更让彭凤妹意想不到的,是2007年前村里买了商品房住到县城的12户农户,有11户陆续回到村里建房。短短两年时间,村里有36户人家像她家一样住进了独门独院的楼房,还有12户正利用农闲时间打地基筹建新房。

受修路、建房的拉动,去年有8户村民买了小汽车,80%农户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在摩托车、电话、电视机普及的基础上,去年下半年起,买洗衣机、电冰箱成为新的消费时尚。

彭家村的变化,源于2007年4月起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两年来,省、市、县财政和对口援建单位总共投入30万元“改路”、“改水”、“改厕”。村小组组长彭义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村民建一所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建材及人工费用、室内装修、家具、家电等,起码会带动20多万元的消费支出。算下来,政府投入30万元,两年来,在彭家村至少拉动了1000万元的消费。

这么多建设资金从哪里冒出来的?大都为近年来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的积累,以及一些村民变卖了县城的房产。为何以前宁愿花上10万元去县城买房,也不愿花一两百元改善房前屋后的道路和环境卫生?因为他们在土地上看不到农村的希望,手上有点钱,都往城里跑。彭义金分析说:“四两拨千斤。新农村建设好政策给村民建设自己的家园提供了一个好支点,政府的投入激发了农民的消费潜力。”

链接

近年来,农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消费意愿明显增强,但是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依然很大,如在南昌市,占全市总人口53%的农民,只消费了全市11%的商品和服务(详见图表)。

另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南昌市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52.58亿元,同比增长25.36%,远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增幅。如此大量的现金为何没有转化为消费而沉淀为储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农民消费信心不足,不敢消费。”南昌市统计局农村调查队队长熊晓洪认为。

那么,撬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支点到底在哪里?

增加消费能力——农民收入增长,但不稳定

“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这是南昌县三洞村刘小毛的口头禅。所谓“带毛的”,是指一些效益较好而风险相对高的畜禽、水产等养殖业。效益高为何反而不算家产呢?“养殖业即使赚了钱,也是‘浮财’,说不准再过一年行情不好,前些年赚的钱都贴进去还亏本。”这位45岁的农民说。

在村里,刘小毛本是种田好手。听说养鱼赚钱,去年他承包了15亩水面养草鱼、鲢鱼,没料到鱼价下跌而鱼饲料涨了三成,一年下来竟然净亏5万多元。

农业的比较效益差,且近年来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导致农民可预期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在进贤县三阳集乡凤凰村,姜海军家去年秋天收的1万多斤花生无人问津,至今还压在家里。“2007年秋收时每斤花生能卖2.6元,去年每斤1.5元都没人要。”这让老实巴交的姜海军至今苦恼不已。

从南昌市近两年的农民增收情况看,2007年、2008年尽管增幅都在14%左右,但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7.9%和15.6%相比,农民收入不仅基数很低,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据进贤县农业局副局长舒兴华测算,去年进贤县平均粮食亩增产产6公斤,早、晚稻价格平均较上年上涨0.2元/公斤左右,但农资价格平均上涨20%以上。农资价格的快速上涨,不仅完全抵消了粮食增产的收益,而且上级财政给每位种田农民平均141元的政府补贴,也全搭进去了。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实现10%的增幅,基本上来自外出务工经商。

调查中,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呼吁,扩大内需、刺激农民消费,不能仅仅盯住农民荷包

里那几个钱,而应当以更宽广的视野千方百计让农民的荷包逐年鼓起来。

改善消费预期——让农民从“看病贵、上学难、存钱养老”的顾虑中解脱出来

“国家的政策样样好。”三阳集乡凤凰村61岁的姜秀林说,“农村的养老、医保政策都有了,但我80多岁的老哥,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才能糊口。”

近年来,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了全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全免费,农村“低保”和养老政策也在逐步推广,但是,“广覆盖,低水平”的农村社保体系,尚没有让农民彻底从“看病贵、上学难、存钱养老”的顾虑中解脱出来。“去年我老婆看病花了3000多元,一分钱都没有报销,因为合作医疗规定,生病只有住院后才能报销40%的医疗费。”姜秀林说。可见,像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问题,依然让农民在消费时有很大的顾虑。只有切实解决好这些农民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才能给农村消费“松绑”,让农民更敢消费。

扩大消费需求——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和消费环境不够好,抑制了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

在安义县彭家村,3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带动了村民们至少1000万元的投资和消费(详见链接)。红火的新农村建设说明,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消费环境,是撬动农村消费的重要支点。

事实上,在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很多。“但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中,立项门槛太高,一些项目甚至包装越大争取到的投资越多,而农民门前屋后能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项目,连立项的资格都没有。”南昌县委农工部副部长苏斯华说,比如水利项目投资量至少5000万元才能立项,标准化农田改造项目也要求在5000亩以上。

对此,三阳集乡凤凰村村委会主任姜招凤深有同感。凤凰村地处鄱阳湖南岸,由于缺少必要的水利设施,这里“下雨淹,天晴旱”,现有的5000多亩耕地,只有2000来亩能种季水稻。姜招凤说:“我们估算过,只要投资80多万元完善排灌设施,2000亩季稻田能改种双

由几个“没想到”想到的

唐 帅

记者进村入户的调查,“摸”到了不少我们没想到的情况:

统计人口4200多人,实际在村里消费的不足200人;农机补贴政策简便而实惠,让农民敢于消费动辄上万元的“大宗商品”;3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带动了农民超过1000万元的投资和消费……

季稻,其他3000亩旱地也至少能种一季水稻。为此,我们村一年不仅能多产500万斤粮食,而且一年可增加近500万元收入。”

发挥政策效应——相比“农机补贴”,“家电下乡”政策尚可进一步完善

2月1日,江西省正式启动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江西省有关方面估算,此举将带动江西省300亿元的农村市场消费。

“补贴的政策是好的,但我感觉还不够实惠。”在南昌县蒋巷镇河边村芳门村小组,35岁的应惟波说。他想买台洗衣机,但是,“全县只有县城一家‘国美电器’有‘家电下乡’柜台。买台洗衣机就干把块钱,为了享受100多块钱的补贴要跑30多公里进城,这点补贴,连搬洗衣机回家的运费都赚不回来。”应惟波说。按照“家电下乡”的补贴程序,要求购买人在购买时全额付款,然后凭专门发票到乡财政所申请,再到县财政报销,需要至少20天。

“在农村最立竿见影的刺激消费政策,就是农机补贴。”进贤县副县长郑响龙认为。以传统眼光看,在人均纯收入只有5000多元的农村,动辄数万数十万元的农业机械,应当属于“超大宗消费”。但是,从2006年起,财政按购机款的30%给购买农机的农户进行专项补贴,在血吸虫疫病区“以机代牛”的政府补贴甚至高达50%,而且在购买时直接扣除补贴款。

以进贤县为例。2008年,中央和江西省财政为该县农民购买的2849台农业机械支出补贴1291.12万元,农民自购机款部分约2600万元,带动柴油、零部件和培训市场消费约1000万元,濒临破产的县农机厂重新满负荷生产。据测算,2009年江西省财政下达的3.2亿元农机补贴,可拉动江西省12亿元左右的农机消费。

由于农机属于生产性支出,与彩电、冰箱等“只耗电的摆设”不同的是,农民既可以用它解决自身的生产,也可以出租经营获得收入。加上补贴手续较为简单,所以农机补贴深受农民欢迎。

农机补贴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政策效应,就是由于农机的逐步推广大大降低了耕作中的劳动强度,从而增强了农业生产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据进贤县农业局副局长舒兴华介绍,全县4.9万名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中,今年春节后至少有3000人选择留家务农。

“家电下乡”和“农机下乡”的对比告诉我们,政府刺激内需的好政策如何变成农民期盼的“及时雨”,是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那么,撬动农村消费的支点在哪里?还是要从“增加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扩大消费需求”这几点做起。

启动农村消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扩内需、保增长的权宜之举,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熨平经济波动的长远之举。要真正把农村消费市场激活,关键在于找准支点,发挥政策的最大效应,让农民不仅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更能够放心花钱。

快 评



图为海河入海口。

向市民公布。市委常委会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越是在经济形势出现困难的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计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被列为新20项民心工程第一项,确保为16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比上年增长26%;“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列为第二项,确保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均达10%;“继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列为第三项,确保全年新增就业38万人,建立面向城乡就业困难群体的援助制度。桩桩件件心系市民的生产生活,民生计民生年年都有新改善。

人民时评

山西屯兰煤矿,一个“保持百万吨死亡率零纪录”的品牌煤矿,没有因连续多年无安全事故而名扬天下,却为一场突如其来矿难而广为人知。

灾难如此无情,只一瞬间,它在吞噬鲜活生命的同时,也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甚至动摇人们一直以来坚守的某种信念——“现代化大矿也会出事?!”这是遇难矿工家属和矿难幸存者的苦苦追问,是舆论普遍的关注,也是令一向以“没有一块煤带血”而自豪的煤矿管理者难以接受的现实……

在人们印象中,重大矿难事故总与中小煤矿,特别是小煤窑结缘,原因不外乎监管失范、违规操作、安全保障不到位等等。而每天开会强调井下安全、经常培训、每日一题、每月一考,下井前提前一小时做安全准备的大型煤矿,是很少出问题的。

事实并非如此。初步调查表明,屯兰矿存在通风管理不到位、瓦斯治理不彻底、现场管理不严格、安全措施不落实等等问题。员工井上对答如流的安全知识,还是抵挡不了井下突发的灾难。山西省省长王君在24日的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大会上的话一针见血:“高投入不等于绝对安全,设备、人员、管理一步不到位,就可能酿成大祸!”

有些本该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社会责任等方面作表率的企业,不时出现各种问题,这其中原因何在?

过去,政府对国有企业管得比较多,从生产计划到安全管理,事无巨细。许多问题,企业没想到的,政府替企业想了;许多措施,企业落实不下去的,政府帮忙落实了;许多风险,政府与企业一起扛了。但现在,国企改制上市,一些原来政府承担的监管职能转而由市场来完成,原有监管放松了,市场监管机制却又失灵,监管出现了真空。

在分析屯兰煤矿事故原因时,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说,“虽然近年来大矿的管理水平、生产水平大大提升,但不等于百分之百安全,特别是生产周期较长的大矿,容易出现思想麻痹。”不让企业出现思想麻痹,就得加强监管。屯兰煤矿不是上市企业,无须对外公开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企业的安全生产系数、员工的安全作业指标,如果不是发生事故,外界不会也无从去追问这些安全数据,对屯兰煤矿,要依靠市场监管显然不现实。至少在现阶段,细致、有效的监管机制,仍然是促进这类企业良性运转的重要保证。

很多国有大企业,是当地政府的放心企业,但放心不等于放松管理。屯兰矿难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如何完善对国企各项监管?这很值得深思。

完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健全公共卫生政府补偿机制,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等。

春节前夕,海河之畔,布展面积1万平方米的天津规划展览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展示了天津城市的变迁和未来的蓝图。开馆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总体规划展区、交通规划展区、中心城区规划模型展区、滨海新区规划展区、海河规划展区、旅游规划展区,令人目不暇接,市民兴奋地带这儿寻找家乡变化的足迹。

天津聘请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团队,进行空间战略、重点区域、产业发展等规划的系统研究,编制了119项重点规划,打破常规,勇于创新,完成了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在城市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形象提升等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去年以协办北京奥运会和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为契机,全市上下大于150天,综合整治市容环境,提升了天津火车站前广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20片重点地区的景观水平,整修入市公路、铁路沿线、市区道路、历史风貌建筑,净化、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常住的居民、初来的游客啧啧赞叹城市面貌的新变化。

3月1日起,天津将继续奋战150天,实施新一轮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新建绿地“生态绿肺”2600万平方米,整治的范围比去年更大,改善的亮点比去年更多。

最近,天津政府部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大提速,24小时接受企业诉求,减少了市级审批事项367项,新设立企业的审批时间从3个月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同时,进一步改进党委、政府机关作风。

2月12日,和平区民政局党委书记赵滨上午参加市政府综合会议,10个专项会合一,用时85分钟;下午参加和平区委党群工作会议,5个专业会合一,用时70分钟。“保增长,要靠实干,就要为基层腾出时间,清新务实的风气好!”他说。

全市上下齐心协力,营造团结和谐稳定、风清气顺心齐、想干事干千好的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天津迈向科学发展的春天!

如何完善对国企的监管